

# 中国式现代化对拉美现代化困境的克服

兰 洋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20世纪下半叶以来,拉美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了一系列困境。其根源在于没有处理好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本国特色、外源现代化与内生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则从领导力量、核心目标、发展战略、政治体制、文化建设、环境保护和内外关系等七个方面成功破解了拉美模式的弊端,生成“全面现代化”和“内生现代化”全新方案。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和拉美现代化分别代表了不同时空条件下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典型实践,而其不同的命运更是可以作为比较研究的关键样本。在比较研究视域中,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而且超越了现代化的普遍性和个体道路的特殊性之间的二元对立,为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全新典范。

**关键词:**发展困境;拉美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23)06-0024-09

**DOI:**10.14134/j.cnki.cn33-1337/c.2023.06.00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为其提供了全新选择。”<sup>[1]</sup>在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历程中,以阿根廷、墨西哥、巴西、智利、委内瑞拉等国为代表的拉美模式曾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一方面,拉美国家自19世纪20年代摆脱西方殖民统治后,便一直致力于实现现代化,并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取得显著成果。另一方面,拉美国家在70年代以后又普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资源诅咒”“塔西佗陷阱”等一系列困境,其现代化的势头被极大遏制甚至出现倒退现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走过了发达国家数百年的工业化历程,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进一步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新篇章。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和拉美现代化分别代表了不同时空条件下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典型实践,而其不同的命运更是可以作为比较研究的关键样本。我们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从七个方面成功破解了拉美模式“依附式现代化”“低质量现代化”的历史困境,生成了“自主式现代化”和“高质量现代化”的发展方

**收稿日期:**2023-06-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的哲学研究”(23ZDA01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哲学研究”(22AZX003)

**作者简介:**兰洋,男,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当代政党研究平台研究员,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社会理论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案。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伟大成就的秘诀,也是社会主义中国为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贡献的全新选择。

## 一、拉美现代化的主要困境与根源审视

拉美地区追求现代化的历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独立运动到大萧条;第二个阶段:“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性的滞胀;第三个阶段:80年代后全面移植新自由主义体制。纵观这三个阶段,拉美通向现代化的路程始终步履蹒跚。一方面,拉美现代化在20世纪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经济总量、基础设施和政治结构均发生了重大变革,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升。但另一方面,就整个拉美地区而言,现代化水平仍然较低,出现了严重的发展问题,比如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政治民主化的质量不高、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严重、过度城市化问题突出、体制改革滞后等等。由此,拉美被普遍划入不成功的现代化或有缺陷的现代化的行列之中。针对拉美现代化出现的种种困境,不同的理论流派有不同的解释。西方现代化理论主张,拉美困境的根源在于未能全面接纳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依附论则主张,拉美困境恰恰源于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依附关系。我们认为,拉美现代化之所以不成功,其原因是多方面、系统性的,必须在古今内外的复合坐标系和现代化模式的横向参照系下予以综合性把握。具体而言,突出表现在领导效能、核心目标、发展战略、政治体制、文化建设、环境保护和内外关系等七个方面。

第一,就领导效能而言,拉美现代化过程中始终存在领导力低下的积弊。纵观近现代世界历史,实现现代化从来都是一项充满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的事业。因此,领导力量的性质、能力和作用是关键性的因素,将决定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拉美现代化的特点是由家族式政治门阀、西方化的政治精英甚至军人集团领导国家,而且普遍经历了外来势力与本国威权体制紧密结合的阶段。从领导力量的属性上说,拉美各国往往形成对内由少数精英垄断政治权力、对外则依附西方发达国家的局面。其历史后果是形成严重的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孕生了内外勾连的强大利益集团。由此,拉美政坛始终丑闻不断,政治报复频发,政党政治被本国利益集团或外国资本所捆绑。从领导力量的执政效能上说,拉美各国普遍缺少坚强有力且能够制定长远战略的执政党,缺乏系统化解政治和社会危机的能力。即使进入21世纪后,体制性危机仍然不断出现。如洪都拉斯(2009年)、厄瓜多尔(2010年)、巴拉圭(2012年)、巴西(2015年)、委内瑞拉(2014年至今)等。

第二,就发展目标而言,拉美现代化实际上是以西方为蓝本的“追赶型模式”,因而仍然属于“资本主导型”现代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资本积累规律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sup>[2]743-744</sup>也就是说,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的固有特征就是整个社会在财富占有上的不平等,从而引发社会本身的结构性的“断裂”。因此,我们在拉美各国普遍能够看到,在经历了初期经济的增长后,迅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突出表现为严重的贫富不均和两极分化、城乡关系失衡、城市病大量涌现、大量人口失业、公共服务不足等。还要注意,拉美地区由于特殊的历史境遇、地缘位置、文化传统和资源禀赋,其现代化又具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殊矛盾。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曾指出,一些国家“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sup>[2]9</sup>。这一论断对拉美国家同样适用。在拉美现代化进程中,不仅有经济周期性危机、物质主义膨胀、人的异化等“资本现代性困境”,而且还有“资源诅咒”“经济主权域外性”等特殊矛盾,造成深刻的社会危机。

第三,就发展的战略导向而言,拉美现代化始终在“依附发展”与“脱钩发展”之间徘徊不定<sup>[3]</sup>。一方面,部分拉美国家高度依赖西方国家的资本、技术和市场,甚至让渡经济主权来换取西方的支持,结果是沦为经济附庸,发展的成果被国外势力所占有。另一方面,一些拉美国家长期僵化地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导致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其结果是延误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使得自身牢牢困在粗放增长方式之中。这两种误区的共同结果就是拉美长期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中低端,陷入“低质量发展”的怪圈。近年来,随着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物联网、新能源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时代的到来,拉美国家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失衡的缺点被进一步放大,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遭遇普遍困境。

第四,就政治体制而言,拉美国家先后经历了考迪罗主义、寡头威权主义、民众威权主义、官僚威权主义的阶段,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选择移植西方式民主制度<sup>[4]</sup>。但是,盲目引入西方政治制度的后果却是引起了一系列“水土不服”,政治生活乱象丛生。近年来,随着西方式民主政治在全球范围内日益极化,拉美各国(地区)的政治结构性分裂也日益加深。比如,在一些拉美国家里,“偏好动员”(Mobilization of bias)和“地域主义投票行为”(Regional voting)大量涌现,造成政治撕裂、共识缺位、执政效能低下等一系列弊端。许多重大的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和外交政策朝令夕改,许多涉及国计民生的问题由于无法取得政治共识而被一再搁置,难以形成长期性和整体性的布局,政治发展深陷“塔西佗陷阱”之中。

第五,就文化样态而言,拉美有着悠久历史和璀璨文明。但是自殖民时代以后,拉美被美欧强行拽入全球化浪潮,成为西方文明的“延伸地带”。“二战”以后,拉美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文化也在迅速变相,民族化与西方化成为文化论争的核心问题。突出表现为文化传统失落、社会道德滑坡、意识形态混乱等。近年来,跨国资本的长驱直入以及新自由主义的泛滥,拉美经济盛极而衰,文化面临深刻危机,出现了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流行文化堕落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表明拉美现代化仍深陷于“古今”之争和“东西”之争的思维范型之中。

第六,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拉美现代化过程中有着惨痛教训。拉美地区本来是生态环境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但由于长期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生态问题。比如,森林大面积损毁,水资源污染,水土流失,空气污染,城市大量废弃物堆积,等等。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仅在1990—2005年间,拉美地区的森林面积就减少了6450.6万公顷,占森林总面积的7%。这一速度大大超过了亚洲和非洲地区,成为世界毁林的重灾区<sup>[5]</sup>。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拉美现代化依据的是功利化的自然观和物质积累至上的传统发展观,以牺牲环境的方式换取短期的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去工业化”过程后,许多拉美国家的产业高度依赖资源出口,资源的过度开采和消耗给环境带来了不可修复的损害,导致了“资源诅咒”。另一方面则是西方生态剥削和污染转移的结果。拉美环境恶化不但是本国范围内人与自然的冲突,更是在西方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下生态非正义的直接后果。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就曾指出:“空间权利是全球化时代贫富之间最悬殊的差异,发达国家的环境免责权是一种新型帝国主义,是资本增殖最新和最有力的保障。”<sup>[6]</sup>发达国家以经济政治上的优势迫使拉美国家接受其制定的“国际准则”,成为后者生态危机持续恶化的重要根源。

第七,就内外关系而言,拉美现代化既不能摆脱国际资本的宰制,更无力改变以“中心—边缘”为特征的世界旧秩序。从历史上看,拉美现代化的历史机遇是西方所提供的,因此拉美现代化无法彻底摆脱对西方资源、权力和理论的依赖。从现实上看,它所追求的是从所谓旧秩序的“边缘”走向“中心”的目标,丝毫不触动内含掠夺性的国际“等级性阶序”。相反,部分拉美国家还时常配合霸权国家针对其他新兴经济体进行科技封锁、绿色壁垒、反倾销、舆论打压等,用以维护西方大资本集团对全球高附加值产业、金融系统和尖端技术的高度垄断,维持霸权国家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优势地位,维护二战以

来以美国为中心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国际分工体系。

综合上述七个方面,可以概括地说,拉美国家现代化之所以几经挫折,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处理好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本国特色的关系,无法有效应对现代化的外来移植和本国国情的内在矛盾。当然,出现这些问题,并不都是拉美自身战略选择的问题,也与发达国家对拉美的长期操纵、剥削和推行霸权密不可分。正如依附论—世界体系论等左翼学者所揭示的,发达国家所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内嵌着系统性的剥削,即通过直接榨取利润、垄断性贸易和不平等交换来实现剩余价值由边缘向中心的转移<sup>[7]</sup>。因此,发达国家千方百计地维系拉美低质量发展和依附性发展的地位,使之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美发展困境所表征的恰恰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世界秩序中面临的普遍性困境,可以概括为“依附性现代化”和“低质量现代化”。反过来说,对这一系列困境的克服就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是人类现代化历史上的一次根本性突破。

##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比较优势与历史突破

与半个多世纪以来拉美地区现代化的曲折进程相比,中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发展成绩。2022年,中国稳居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1万亿元,多年对世界经济贡献率超过3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万美元,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制造业连续十多年居全球首位,货物贸易、谷物产量、外汇储备等均居世界第一位<sup>[8]</sup>。上述成就表明,中国的发展跨越了拉美现代化的一系列陷阱,真正找到了发展中国家突破现代化普遍性困境的全新思路,开创了一条以社会主义制度引领民族发展道路进而解决人类普遍性问题的现代化新道路。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克服了拉美现代化“领导力低下”的积弊。与拉美现代化过程中领导力量或缺位,或腐化,或软弱无能,或更迭频繁的种种弊端相比,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优势是有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的领导力量。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sup>[9]</sup>从阶级属性上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将为民造福作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保证了发展成果不会被特殊利益集团或外国势力所窃取,保证了现代化事业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指导思想上说,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通过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为现代化事业能够行稳致远、不断战胜各种风险挑战提供了理论指导。从执政效能上说,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时代大潮中蕴含的历史机遇,有效应对全球风云变幻带来的风险挑战。用系统观念审时度势、谋划布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政治品格上说,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的历程中形成了坚持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在关键时刻,敢于刀刃向内,以“猛药去疴、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断破除自身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加强党内监督、严肃党内生活、坚持党员教育等不断纯洁党的肌体,形成了破解历史周期律的第二个答案。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摒弃拉美现代化“资本统治”的困境。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本质特征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它充分吸取拉美现代化过程中资本野蛮生长、贫富剧烈分化的历史教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一大秘诀就是创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有效抑制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真正确立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sup>[10]</sup>。具体来说,在生产关系上,中国式现代化

正确区分了资本的生产资料属性与生产关系属性,合理剥离资本逻辑的文明成就与异化形式,在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在发展目标上,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资本增殖为轴心的剥削逻辑,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逻辑。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时代十年来,从收入水平到社会保障,从卫生健康到生态环境,从居住品质到交通出行,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在制度体系上,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历史性结合,开创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体系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国家—资本—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凸显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双重优势。在社会分配上,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以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而非资本攫取最大利润为目的,使社会财富的增长更大程度和更高水平地惠及人民群众。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实现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不断推进共同富裕取得更加实质性的进展。可以看到,正是由于走出了一条“驾驭资本”的发展道路,中国成功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开创出了发展中国家跨越式进阶的新路。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拉美现代化“低质量发展”的局限。与拉美等国徘徊于“依附发展”与“脱钩发展”的战略迟疑不同,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地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形成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就集中资源短时间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历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1982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sup>[11]</sup>正是由于具备发展的“自主”意识,我国才能在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避免陷入依附发展的窠臼之中<sup>[12]</sup>。进入新时代以后,我们提出并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纵观改革开放尤其是新时代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式现代化能够突破低质量陷阱的基本经验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拉美国家“弱政府—弱市场”的情况不同,中国深化了对市场和政府二者关系的认识,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结合起来,形成了“强政府—强市场”的全新模式。二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与拉美国家近年来“去工业化”趋势不同,我国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积极抢占全球技术高点和产业链高端,打造了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引领力的新兴产业集群。三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拉美国家普遍存在城乡差距过大不同,中国通过脱贫攻坚,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到2035年,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将实现均等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四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拉美各国区域分化严重,产生了大量的城市病和贫困地区。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定和推进了一系列重大区域战略,如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形成了区域协同发展、优势互补的良好局面。五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既不是闭关自守,也不是依附发展,而是始终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黏合度,着力打通影响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堵点,有效释放中国作为超大经济体所蕴含的规模经济巨大空间。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拉美现代化“制度移植”的窠臼。与拉美各国照搬照抄西方政治制度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则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成功克服了“塔西佗陷阱”。在民主内容上,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是片面的、局部的、

零散的,而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重视民主选举,而且将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贯通起来,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从根本上克服了“选票政治”重形式轻实质、重竞争轻协同的弊端。在民主制度上,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完整制度体系,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基本政治制度,形成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人民群众可以依法通过各种民主制度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在民主效能上,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真正有效、管用的民主。既充分保障了人民的民主选举权利,又实现了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全覆盖,有力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务中。在民主评价上,全过程人民民主突破了含有意识形态偏见的单一评价论,构建起尊重国情、客观有效的评价体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sup>[13]</sup>全过程人民民主建立在汲取世界各国民族经验与优势的前提下,同时也尊重各国自主选择适合自身的政治制度模式的权利,倡导各国之间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交流互鉴。

第五,中国式现代化化解了拉美现代化“文化迷失”的悖论。与拉美普遍存在的文化冲突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样态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多元融合所形成的新型现代文明。这种文化既传承发展中华文化,又立足当代中国现实,超越了“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了从文化自省到文化自觉再到文化自信的发展过程,汲取了包括拉美现代化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在汇入世界文明主流的同时保持了自身文明的主体性。尤其是新时代以来,文化自信命题的提出,确立了文化建设的方向,体现了中华文化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从容姿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sup>[14]</sup>。中国式现代化所凸显的文化自主性,既不是拒斥全球化的文化孤立主义态度,也不是照搬照抄的文化主体缺位状态,而是建构中华文明的当代形态,化解“古今中西”的文化矛盾,同时回应解决人类全球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具体而言,近年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成果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二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是全方位推进以文化强国为目标的文化创新,四是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五是实施文明互鉴的文化走出去战略。总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话语呈现出现代定向、民族定向和社会主义定向的统一。它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文明底色;锻造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升华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广泛的世界意义。

第六,中国式现代化汲取拉美现代化“破坏生态”的教训。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充分汲取了拉美国家生态灾难的经验教训,推动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建设要平衡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处理好人口过剩、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问题。进入21世纪后,中国又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全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显著特征。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通过统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开创出一条兼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一是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用地结构调整,推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化、低碳化。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淘汰高能耗的过剩产能,形成以绿色资本、绿色科技和绿色能源为新动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形成

强大的绿色自主创新能力。二是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持续深入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系统化思维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治理,加强污染物协同控制,着力消除重污染天气,打好重点江河湖库保护修复攻坚战,维护海洋自然再生能力。三是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着力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加快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建设,有效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经过上述努力,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生态成就,创造了多个全球第一: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迅速,风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设备生产规模居世界第一,多晶硅、硅片、电池和组件占全球产量的70%以上<sup>[15]</sup>。同时,中国式现代化还突破狭隘的民族视域,真正站在世界历史和文明进步的高度,坚持本国利益与世界整体利益相统一,以国际主义的全局视野承担起为全人类谋幸福的国际责任。中国不仅不遗余力地推进“双碳”工作,以切实可行的方案一代接着一代干,履行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而且积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推动各方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形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强大合力。中国树立的“携手合作而非相互指责,持之以恒而非朝令夕改,重信守诺而非言而无信”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已经得到全世界进步力量的广泛赞誉,成为推进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坚力量。

第七,中国式现代化终结了拉美现代化“依附霸权”的逻辑。与拉美国家深受西方发达国家的控制和剥削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则主张变革近代以来等级化的国际权力结构,超越“中心—边缘”权力倒手的陈旧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sup>[1]</sup>这种开创性首先表现在一个有14亿人口、广袤的国土面积和悬殊的地区差异的发展中大国迈向全面现代化,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更加重要的是,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重复拉美国家依附既有世界格局的“外延式”路径,而是“人民共同富裕”与“各国合作共赢”、“承认既有格局”与“建构未来秩序”相统一的内涵式发展。中国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是保证各民族平等生存和世界文明多元发展的最佳实践方案。当今时代,“前所未有”的中国发展与“前所未有”的世界变革时空交织。面对发展过程中的不稳定性因素,“中国方案”为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优质公共产品,符合发展规律和各方利益,必将引领全球的公平正义和共同进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就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即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力量,统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共同塑造普惠合作、共同繁荣的经济“共赢体”,平等协商、和而不同的政治“共容体”,普遍安全、持久和平的安全“共建体”,交流互鉴、开放包容的文化“共情体”,绿色低碳、清洁美丽的生态“共生体”。

### 三、在比较视野中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sup>[16]</sup>在比较研究的视域中可以看到,中国式现代化从领导效能、核心目标、发展战略、政治体制、文化建设、环境保护和内外关系等七个方面成功破解了拉美模式的弊端,实现了人类现代化史上的重大突破。如果说拉美现代化困境表征了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必然遭遇的矛盾冲突,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则证明了其不仅符合中国国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而且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这一世界意义就在于:真正超越了普遍道路的抽象性和个体经验特殊性、现代化的外源性因素与内生性因素之间的二元对立,生成了“自主式现代化”和“高质量现代化”的现实道路。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实践表明,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转型,既不能搞割断历史的简单移植,也不能搞盲目排外的闭门造车,更不能搞亦步亦趋的跟随模仿。一段时期以来,在拉美、非洲等地区,一些发展中国家曾幻想“西天取经”,照搬照抄西方模式,结果水土不服,陷入发展长期停滞、社会政治动荡的泥潭。个别大国不顾各国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的巨大差异,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理念强加于人,推行“民主改造”,策划“颜色革命”,结果造成动乱冲突和人道灾难<sup>[17]</sup>。说到底,都是没有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没有摆脱所谓“翻版”“移植”的思维误区,无法提出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的非西方现代化的可行方案。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则蕴含了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不仅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为全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而且为发展中国家寻求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实现长治久安、消除极端贫困、促进共同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挑战提供了中国方案。

在比较研究的视野中,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的拉美模式相比,中国式现代化都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自主的话语逻辑、明显的制度优势和强大的自我完善能力,构成完全不同于人类过往实践的伟大创造。一是立足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立足于对世界文明的主动性借鉴和自主性融合,在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中走好自己的路,开创了具有悠久传统、大国气象、东方气质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二是超越了以往现代化理论的话语范畴和想象空间,真正找到了破解发展中国家历史困境的全新思路,在基本性质、主要特色、总体布局、本质要求、终极目标等方面实现了现代化理论的范式重构与术语革命<sup>[18]</sup>。三是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3个方面的制度优势,全方位深化了我们党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开创了一条以社会主义制度引领民族发展道路进而解决人类公共性问题的现代化新道路。四是不断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进行自我完善。对内将改革进行到底,既破除沉疴痼疾,又保持战略定力;对外坚持开放,既主动融入世界,又坚持独立自主。以伟大斗争精神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外部风险挑战,不断交出人民之问、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的“中国答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sup>[1]</sup>发挥好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新现代化的引领作用,既是指导新时代的中国现代化实践、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现实所需,也是实现“文明互鉴”,夯实发展中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所向,更是拓展人类走向现代化的有效路径,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使命所在。只要我们胸怀两个大局,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持续回答自身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直面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挑战,就一定能够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力量,以大担当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世界的新图景。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N]. 人民日报, 2023-02-08(1).
- [2]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 [3] 兰洋. 中国式现代化对后发国家不发展理论的超越[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3): 1-9.
- [4] 韩琦. 20世纪拉丁美洲的变革与发展[M]//杨栋梁.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7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167-196.
- [5] 黄鹂,蔡弘. 拉美国家生态环境变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2): 56-61.
- [6] GORZ A. Capitalism, Socialism, Ecology[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Books, 1994: 232-233.
- [7] 布鲁厄. 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M]. 陆俊,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3: 16-18, 166-176.

- [8]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 北京: 国家统计局, 2022.
- [9]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11-12.
- [10]王鑫.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共同富裕: 内涵、价值与路径[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22(3): 24-33.
-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3.
- [12]燕连福.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演进、内涵扩展和未来指向[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3): 30-39.
- [13]习近平. 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6.
- [14]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40-41.
- [15]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国绿色发展白皮书[R]. 北京: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23.
- [16]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23-24.
- [17]齐玉. 深刻领会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凝聚奋进新征程磅礴力量[J]. 求是, 2023(8): 69-74.
- [18]陈曙光. 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3(4): 30-35.

##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Overcoming the Dilemma of Latin American Modernization

LAN Yang

(School of Marxis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have encountered a series of difficulties in their modernization process. The root cause lies in the failure to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eneral laws of moder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external and internal modernization. In sharp contrast,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as successfully solved the drawbacks of the Latin American model in seven aspects: leadership, core objectives, development strategy, political system, cultural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hips, and has generated new plans for “comprehensive modernization” and “endogenous modernization”. Therefore,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Latin American modernization respectively represent the typical practices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ir pursuit of modernization under different time and space conditions, and their different fates can be used as key samples for comparative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research,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not only the only way to achiev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China, but also transcends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the universality of modernization 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individual path, setting a new model for the world, especially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Key words:** development dilemma; Latin American modernizati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new forms of human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 张伟 李裕政)